

萱野长知与两次中日和平调停

陆 伟

内容提要 在日本第二次侵华战争期间的“和平”运动史上,象萱野长知那样为中日双方共同接受、贯穿两次“和平”调停始终的重要人物,是绝无仅有的。本文意在通过阐述萱野出任调停使者的背景,其活动的过程与结果,剖析萱野的中日和平理念及其与本国政府“和平”计划的本质区别,揭示日本侵略集团对蒋媾和的真实意图和国民政府的因应态度,以期从一个侧面,深化关于中日战争期间“和平”运动问题的研究。

关键词 萱野长知 “和平”运动 国民政府

萱野长知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一个重要人物。然而,对他的研究并没有引起中外史学界足够的重视。以往论著在述及相关问题时,不是只字不提,就是语焉不详。本文拟以日本公布的文献、档案,阐述萱野在九一八和中日战争期间从事调停活动的来龙去脉、性质、历史地位及其与日本诱降政策的关系,以期对他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全面、公正、客观的评价,并进一步深化对中日交战时期“和平”运动问题的研究。

参见拙稿《抗日战争前期日本对蒋介石“和平工作”的构想及其策略》载《党史研究与教学》1997年第2期,又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1997年第7期。

萱野的第一次中日和平斡旋,是谋求和平处理因九一八事变恶化的两国关系。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首相犬养毅实现个人政治野心的一种产物。

犬养曾是日本大正时期炙手可热的政治家。对内恪守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信条,对外鼓吹利用中国革命党以扩大日本的权益。因此在日本政治史上留下“民主立宪之神”、“热心赞助中国革命”的美誉。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政客。在几十年宦途生涯中,除了三次短暂出任阁僚外,绝大部分时间多为在野的“布衣之士”。他为谋求登上权力顶峰,1925 年将其统率下的革新俱乐部与长期政见不同的政友会实行合并。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竭力抨击若槻内阁的“软弱外交”,博得军部和强硬派的好感。在著名的“亲军派”、干事长森恪的撮合下,1931 年 10 月 12 日当选为政友会总裁。12 月 13 日,取代若槻内阁,执掌政权。

对行将退出政治舞台,却仍能以 77 岁高龄爬上首相宝座的犬养来说,首先面临极为棘手的难题,便是处理九一八事变。1932 年 2 月 15 日,犬养在给陆军长老上原勇作元帅的信中,谈及满洲事变引起的内外关系令人忧虑的变动,对内“促使军队一意孤行成风,导致军队统制上的一大变化”;对外“引起与九国公约的正面冲突”。所以他认为,“要尽快结束这次事变,利用此机会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但不是放弃日本在满洲的权益,而是“在形式上止于政权的分立,在事实上则要努力达成我们的目的”。可见犬养是把

[日]林茂等编:《日本内阁史录》第 3 卷,第一法规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53 页。

[日]崎村义郎:《萱野长知研究》,高知市民图书馆 1996 年版,第 216 页。

处理九一八事变问题,同应付国际舆论和恢复军队的统制秩序联系起来考虑。在军部政治地位不断膨胀的情况下,通过外交途径处理对华关系,既能巩固占领东北的成果,又能使外交主导权牢牢掌握在政府手里,排斥军部对外交的干预,压制军内“下克上”的恶习,挽救摇摇欲坠的政党政治,不致使他一生追求的“立宪”目标付之东流。基于犬养派在政友会内部是少数派,受到主流派铃木喜三郎派,特别是慑于党内实权派森恪的压力,犬养只好选择私人秘密途径,来办理对华外交。萱野使华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孙中山逝世后,萱野虽已淡出中国革命的舞台,蛰居日本。但长达30年支持中国革命事业中所孕育的中国情结,使他仍时刻关注着中日关系的发展。尤其是对实现孙中山晚年所倡导的、心中产生极大共鸣的中日大同团结,联合对抗欧美的“大亚细亚主义”抱有深深的祈盼。进入30年代后,中日关系围绕东北问题急转直下,自然令他忧心如焚。1931年9月,萱野于万宝山事件发生后,发表《出自满鲜问题》一文,对日本现行的对华政策提出批评。作为日本人,尽管他是从维护日本利益的立场,从使用武力将给日本造成危害局面的角度,来劝说日本政府放弃武力侵华政策。但其目的,是要求日本政府“立足于日华两国民的共存共荣,以人道主义为着眼点,弃霸道从王道”,认为这才是“合仁义正名分的日本魂的大推销”。其“口号即已故孙中山临终前向我国民呼吁的亚细亚联盟”。萱野还提出解决中日悬案的具体方案:“若提出法权平等并撤消海关,实现内地杂居,满蒙等的局部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如果比较一下,上述萱野同犬养的主张,可以清楚地看到,萱野认为中日和平破裂是日本的武力政策使然,犬养则归咎于中国的排

《萱野长知研究》,第217—218页。

日。萱野的立足点在于谋求中日两国的永久和平,而犬养则是为了确保日本在东北的既得权益,两者旨趣迥异。但在采取和平手段上,两者又有相通之处。加之在以往迎孙居日过程中,多次得到犬养慷慨相助这一历史继源,因此12月15日,当犬养发出“查明中国今日之内情,寻找打开当前极恶时局的方法”的请求后,萱野即欣然接受。双方商定使用暗号电报后,17日萱野同金子克己、松本藏次秘密来华。

此时蒋介石在一片反对“不抵抗政策”的声浪中被迫下野。宁粤对立两方组成“统一”的南京政府,由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长,但外交决定权操纵在政治会议常务委员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手里。21日萱野到达上海,受到居正等国民政府政要的迎接。23日萱野前往南京,在车上同驻日公使蒋作宾举行会谈,随即向犬养拍发了第一份电报。内称,与中国同志达成如下协议:1. 为确立满洲政权,组织以居正为主任的委员会,一切悬案取现地交涉。2. 对张学良进行适当处置。3. 任命居正的同时,日华双方军事行动即刻停止。以上三项南京全体会议通过的胜算极大。24日,萱野在南京与孙科直接会谈。萱野认为,九一八事变突发的原因在于日华两国相互认识不够,和对国联错误的期望。他劝说中方,犬养首相有和平解决事变之意,只要按照中山先生所抱的“大亚洲主义”,同志间进行推心置腹的交谈,就会挽救时局,挽救日华命运。孙科听后表示赞许,并同意交由居正全权处理。25日,萱野给犬养拍发了第二份电报,将双方达成的初步协议报

《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1卷第2册,第480页。

[日]岩崎荣编:《犬养密使·萱野长知的日志》以下简称《萱野日志》,中央公论社1946年8月号,第82页。

《萱野日志》,第84页。

《萱野日志》,第84页。

告如下:1. 设立以居正为主席,许崇智、陈中孚、朱霁清、傅汝霖为委员的东北委员会,其任务是改革东北各省的政府组织,整理行政,维持秩序,查办张学良,解决日华悬案。2. 日华双方维持现状,待居正到任后,立即进行直接交涉,商议撤兵。

上述电报述及的内容,并非萱野的主观臆造和一厢情愿。南京国民政府在诉诸国联,借助英美压力,迫使日本撤兵的幻想破灭后,转向中日直接交涉,蒋汪更是对和谈抱有希望。汪精卫极力怂恿居正进行和谈接触。蒋介石也支持居正与萱野交换意见,研究和平解决的具体条件,想研究一个双方认可的方案后,再由中日政府正式签订条约。由于国民政府的积极态度,双方很快约定,一俟萱野接到东京回电,居正一行即赴满洲,并由参谋本部中国课长重藤千秋预先在满洲从事对军部的调停工作,以协助居正。为使和谈计划尽快实现,萱野在自12月25日至1932年1月2日的短短9天里,又向犬养连发8份电报,敦促当局派遣重要人物赴会,显示出打开中日关系僵局的迫切心情。

然而,就在萱野等待东京回训之际,政府内的强硬派和外务省驻上海公使馆员,内外呼应,紧锣密鼓地开展阻扰和平交涉的活动。

如上所述,虽然犬养采取单线联络的私人秘密外交途径,但是日本驻沪外交公使馆员还是从萱野与中国政要的交情和同犬养的私人关系中,嗅觉到其来华的真实目的,这激起了他们的不满。为避免猜忌,萱野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即主动拜访重光葵公使,透露此行的目的是同中方进行种种意见交换,并坦言是秉承犬养首相

《萱野日志》,第85页。

林济:《居正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5页。

《萱野日志》,第86~87页。

的旨意。12月31日,重光致电外务省,煞有介事地报告:“萱野在南京通过居正与南京首脑部来往,南京方面依照其意见为接收满洲,组织东北委员会,派遣许崇智、居正、傅汝霖、陈中孚、周西成等五名委员不日前往满洲”。外务省接报后认为:萱野使华不仅违反“纲纪肃正的精神”,而且有碍于满蒙分离政策,强烈要求停止萱野的调停活动。掌握内阁实权的书记官长森恪更是担心关东军的“满洲建国工作”由此遭受影响,便乘犬养前往三重县参拜伊势神宫不在东京之际,截获萱野发自上海的所有电报,并扬言扣押发往犬养家的一切电报。

面对各方强烈反对对华媾和的呼声,犬养急忙退缩,抛弃了所谓“政党内阁”的理想,而选择了趋从军部的现实。他一方面竭力辩解,萱野使华是出于本人愿望,其目的并不是要进行某种交涉,而是为了探悉南京方面的动向;另一方面又批准陆海外三省拟定的东三省从中国本土分裂出去的《满蒙问题处理大纲》,并最终于1932年1月5日作出了召回萱野的决定。此后,犬养也曾企图借助陆军元老上原勇作、宇垣一成等人的威望,通过人事变动,确立对军部的统制,并继续派遣萱野来华交涉。但法西斯急进青年将校先发制人,于5月15日袭击首相官邸,刺死犬养。昙花一现的萱野工作宣告失败。

尽管萱野不可能知道调停失败的真正原因,而仅归咎于重光

[日]《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2卷第2册,日本外务省1980年版,第658页。

[日]《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2卷第2册,日本外务省1980年版,第661页。

[日]《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2卷第2册,日本外务省1980年版,第661-662页。

[日]时任英人:《犬养毅》,论创社1991年版,第260页,注57。

[日]《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2卷,第2册,第659页。

[日]伊藤隆等编:《真崎甚三日记》第1卷,山川出版社1981年版,第44页。

的“胆小卑劣”和森恪的“媚军盗窃”行为，但他心中不免产生被人愚弄、出卖的异样感受，哀叹自己：“受到三方指责，即被日本人说成是通敌者，被中国说成是骗子，在犬养先生眼里做了一件萱野不可能做得出的蠢事。”1932年7月25日，他在给旧友伊藤痴游和梅屋庄吉的信中，又愤愤不平道：“腐败混乱的世态，树立大策，吐露正论却无用，徒然被视作狂贼。”因此他决定暂避尘世静养。然而萱野仍在关注中日关系的变动。1936年广田内阁发表所谓日中亲善的声明后，萱野即发表文章，告诫当局，满洲事变以来日本的行动，激化了中国人民的反日感情。因此此等关系放任不管，中日间必酿成惨祸。须以大慈大悲的精神实现政策的大转换。否则广田声明即成沙上楼阁。放弃侵略政策，撤出他国领土为世界公理，萱野却当作日本赐予中国的“大慈大悲”，反映了他狭隘的民族优越心理。但敢于批评日本的对华政策，力劝当局改弦更张，则又体现了他执着秉直的性格。在法西斯独裁统治日益确立的政局下，这是一种有足够勇气的阐发，值得加以肯定。

二

萱野的第二次中日和平斡旋在于谋求中日两国的全面停战，但却不自觉地充当了以小川平吉为首，开展的旨在诱使蒋介石投降，实现不战而胜目标的“民间外交”的工具。

萱野与小川交往颇深。小川曾是东亚同文会的骨干成员，持

《萱野长知研究》，第225-226页。

时任英人前揭书，第240页。

《萱野长知研究》，第231页。

《萱野长知研究》，第233页。

强硬的割占满蒙论调,并主张为此利用中国革命党,因而对萱野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的举动予以大力协助。1914 年,萱野创办《民报》遇到经费困难,得到小川捐助。1927 年小川就任铁道大臣,萱野对田中内阁的“积极外交”表示不满,两人关系渐趋疏远。1936 年小川涉嫌受贿下狱,两人断绝了关系。但中日战争爆发后,以下两个因素促使双方又亲近起来。一是小川基于日本的国力不堪经受对华长期持久战,坚持和平诱降策略,反对武力解决论,酝酿暗中派人接通与国民政府和平交涉的渠道,显然由萱野出面接洽,极易为中国方面所接受;一是小川与近卫家关系特殊。小川青年时代参加东亚同文会,深受近卫首相父亲近卫笃磨的器重。1937 年 6 月近卫内阁成立,小川随即被保释,从此成为近卫首相的“常客”。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频繁出入首相邸宅,密商战争形势和国内政局,为其出谋划策。因此对萱野来说,小川是疏通日本最高层的一条“捷径”。直接获取近卫首相的指示,和平交涉才有凭恃和成功的可能。

1938 年 1 月“陶德曼调停工作”失败,同月 16 日近卫首相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关闭了政府间外交和谈渠道,“民间”秘密外交顿时活跃起来。早在 1937 年 10 月,萱野即来华,在上海景林巷公寓设立事务所,开始找寻和蒋介石政府接触的机会。在整个中日战争期间,萱野的和平试探活动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7 年 10 月~1938 年 9 月),策划孔祥熙——宇垣会谈。主要渠道是:日方经小川平吉通向宇垣一成直至近卫文磨;中方经贾存德通向孔祥熙直至蒋介石。

[日]冈必武等编:《小川平吉关系文书》第 1 卷,美铃书房 1973 年版,第 323 - 372 页。

1938年3月,萱野利用国民政府内的主和派孔祥熙就任行政院长的机会,派其助手松本藏次在上海与孔的秘书贾存德搭上关系,试探和谈意向,得到了孔祥熙的积极响应。萱野即认为和平的障碍主要在于日本军部要价过高。他向中方表示,拟回东京联络同志作后盾,然后分谒内阁、军部、重臣、元老征求意见,一致以谋和平之早日实现。

此时,近卫内阁发生重大改组,由主张对中国开始和平交涉的宇垣一成出任外相。这就为萱野从事上层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氛围。6月9日萱野抵达东京,向小川汇报:孔祥熙等人的媾和决心愈加坚定,准备不通过第三国,直接谈判,促使蒋介石下野,解散国民政府,与北京、南京新政府合流,建立统一的新政府。小川大喜,盛赞打开和谈端绪,始知国民政府内媾和派决心,都是萱野的功劳。6月10日,小川拜访宇垣,告以萱野的汇报,宇垣深表赞许。同日晚经小川介绍,萱野访晤近卫首相,并呈交孔祥熙复头山满函副本等文件。近卫表示支持萱野开辟的和谈渠道。双方约定由萱野将谈判情况及时电告小川,再由小川传达给近卫。11日,萱野单独会见宇垣,获知政府“不必对蒋持坚决排斥态度”的意向。

6月17日萱野离日赴沪,向贾存德提出共产党分离,蒋介石下野,国民政府取消三项条件。7月5日,偕松本同贾存德等人转移到香港继续谈判。又与孔祥熙派去的老友马伯援,居正夫人聚谈。通过与中方人士一个月的紧张谈判。萱野感到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中拥有绝对权威,以蒋介石下野为先决条件的“和平方案”根

杨天石:《孔祥熙与抗战期间的中日秘密交涉》,《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第129页。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第1卷,第384~385页。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第1卷,第385~386页。

本行不通。在他看来,决定谈判能否成功的关键,是日本政府放弃对蒋介石的僵硬立场。一旦突破此点,“时局将急转直下,趋于解决”。为劝说东京当局,7月22日萱野返回日本,访晤小川,又与宇垣、近卫晤谈。萱野汇报说,共产党势力已在汉口蔓延,一旦蒋介石下野,将引起混乱,使局面难以收拾,故无人出面接替蒋。即便有,也不能履行媾和条约,而日本对华占领仅限于点、线,采用和平手段势所必然。近卫、宇垣等人表示,对蒋下野问题可以有所松动,即允许蒋介石能在披沥反共诚意之时,预先作出准备下野的表示,而在和平之后自动实行。在此前提下,宇垣可以前往谈判。

9月上旬,萱野返沪,继续与贾存德接洽。为扫清和谈障碍,萱野要求日本政府进一步作出让步,甚至对蒋介石必须预先表明之意,也不作苛求。他于9月13日致函小川称:“彼等因面子关系,对蒋介石预先表示,在反共和平后坚决下野一事颇感困难,以密约办理也感到非常为难。孔祥熙等共同保证,将于事后自动实行。”萱野还特别指出,今日时局已使和谈成立极其困难,需要有勇往无前的决心。因此必须设身处地替对方的处境着想,抛弃形式上的面子,讲求实际效果。唯有宇垣外相的个人手腕和显示至诚,才能冰解万事。23日,五相会议批准宇垣——孔祥熙谈判,并决定由海军提供舰船,供谈判之用。又上奏天皇,获得批准。

然而,日本陆军热衷于开展的诱降汪精卫为目标的“和平工作”,对以蒋介石为对手的和谈不感兴趣,并通过建立兴亚院,削弱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第2卷,第593页。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第1卷,第392~393页。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第2卷,第596页。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第2卷,第597~598页。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第2卷,第597~598页。

外务省对华外交的决策权。随着 9 月 29 日宇垣被迫辞去外相职务,拟议中的宇垣——孔祥熙会谈遂告搁浅。萱野为自己奔波半年的和平努力最终化成泡影而愤愤不平。他严厉抨击宇垣的优柔寡断,和近卫为图自己的生存而在与陆军对立问题上持隔岸观火的态度。他失望地哀叹:日本已迷上了高宗武之类的便宜货色,而却放弃了货真价实的蒋派。殊不知正是反抗日本的人,才能成为日本的对手。萱野并不气馁,他决心按照自己的思路,继续找寻和谈的线索。

第二阶段(1939 年 1 月~1942 年 1 月),策动小川亲自出马,谋求与蒋介石建立直接联系。主要渠道是:日方经小川平吉通向日本内阁;中方经杜石山通向蒋介石。

孔祥熙——宇垣会谈胎死腹中后,随着日军先后攻占广州和武汉,军部强硬派认为蒋介石已沦为地方政府,在中国建立亲日的新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加快了汪精卫工作的步伐。萱野的和平斡旋显然与之相抵触,因而引起陆军中央的极大反感。他们认为,萱野的行动已违反国策,要勒令其离开香港回国。但萱野表示,自己把与蒋介石政府和平交涉视作一生最后工作,要全力以赴,因此,不管发生任何事情,被军部如何忌恨,都将为确立和平竭尽全力。

1939 年 1 月 4 日,近卫内阁垮台。继任的平沼骐一郎首相鉴于汪精卫的虚弱地位,深感汪等人无法收拾时局,而只有与蒋和平一途。故在众议院会议上公开表示,只要蒋回心转意,则不与之

[日]神尾茂:《香港日记》,载《昭和战争文学全集》别卷《不为人知的记录》,集英社 1965 年版,第 315 页。

[日]神尾茂:《香港日记》,前掲书,第 339 页。

[日]神尾茂:《香港日记》,前掲书,第 328、347 页。

敌。平沼设想,只要蒋同时承诺防共亲日和对付共产党,即刻实行停战。萱野大为振奋,于次日急忙返回。他决心利用政府层内开始出现的对汪失望情绪,劝说当局回到对蒋和谈的路线上来。

1 月 13 日萱野抵达东京即向小川汇报:由于汪精卫出逃降日,整个和平工作陷于停顿;谋求蒋介石政府崩溃,则和平到底无法实现;蒋正积极布置,准备对付共产党,对日和平之意始终未变,并为排除干扰,决心起用嫡系复兴社人物,除郑介民、柳云龙外,增派杜石山参加和谈。杜曾为李济深的参谋长,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期间,引萱野作担保人,两人交情笃深。小川闻后大喜,陪同萱野于 14、18、19 日分别访晤有田外相、平沼首相,还于 23 日拜访近卫前首相,以求谅解。小川认为,由于蒋介石政策重点的转移,再度派遣萱野使华接洽“和平”正是其时。同时鉴于陆军已对萱野极为反感,只有亲自出马,与蒋方代表直接晤谈。

3 月 16 日,萱野与以治牙为名与到港的宋美龄举行非正式会谈。17 日,同柳云龙、杜石山具体磋商和平办法。29 日小川抵港,提出折衷的“便案”:由中日联合讨共,尔后实现停战。如有困难,可以密约方式办理。但反对中方自行决定反共事宜。这实际上是企图以“防共”为名,使日本长期驻兵合法化,同无条件停战、撤兵迥异。因而遭到蒋介石的拒绝。为打开和谈僵局,萱野认为必须首先确立基础条件。4 月 7 日,与杜石山达成三项原则,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平等互让。遭到小川反对。他认为,既然容共抗日是战争的二大原因,排共睦邻则是停战媾和的二大条件。三原则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第 1 卷,第 456~457 页。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第 1 卷,第 436~437 页。

《萱野长知研究》,第 276 页。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第 1 卷,第 445 页。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第 1 卷,第 460 页。

中平等互让会给东京造成麻烦,应予删除。不然改为“双方互让”。至此小川亮出了他对华“和平”构想的底线。但萱野坚持己见,拒不听从,表明在媾和条件上与小川的不同观点。

小川焦急地等待国民政府的回应。但蒋介石虚与委蛇,回避明确表态。对于中方的拖延战术,小川象热锅上的蚂蚁,急不可待。他准备亲赴重庆,并向萱野首次坦露了和谈破裂后的对策,即收缩战线,缩小战面,倾全力于华北建设第二个伪满洲国。控制沿海,采取持久战略,以确保“大陆政策”的推行。萱野对此感到惊讶,他认为“处理中国事情首先要有耐性,不能着急”。最终小川没能等到中方的答复,于6月11日悻悻回国。萱野委婉批评道:“世上大事,总有迂回曲折,还是需要以最初的决心,恪守信念。并确信自己找寻的对华和平之线为唯一线索,有大慈大悲的力量,因此终能设法开辟和平之道。”也许萱野不会明白,他与小川的对华“和平”理念,从一开始就是同床异梦。

9月13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将扶植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列为施政方针,这使蒋介石深感失望,取消与日方重开谈判的计划。10月13日,萱野离港返国,他严厉批评政府的决策:“汪精卫政权的成立只会延误时局,是宫外孕妊娠,最终需要手术。”1940年3月27日,即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成立前夕,他见大势已去,惆怅地表示:“爱妾落籍后,与本妻关系益愈疏远。媒人说好话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第1卷,第464页。

[日]伊藤隆、鸟海靖:《关于日中和平工作的一种史料(一)》,东京大学教养学部《人文科学学科纪要》第66辑,第269页。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第1卷,第467、473页。

伊藤隆、鸟海靖前揭论文,第269页。

伊藤隆、鸟海靖前揭论文,第277页。

《萱野长知研究》,第285页。

也暂且无济于事,相反引起种种误会。”萱野将实现中日和平比作一次结婚,认为本妻是蒋介石,爱妾是汪精卫,表明他对蒋介石正统地位的认定,实际上也是对日本将蒋介石贬为一地方政府国策的否定。鉴于“愚蠢”的日本政府的决策,即便重庆来谈,不定根本,结婚依然难以办到,因此他表示只有静观时局,等待日本的政策发生根本的改变。此后,萱野几次想来港继续与杜石山等人接洽,但由于军部的阻挠,终未能成行,无奈只好转向东南亚,联络华侨,从侧面声援和平运动,也归于未果。1942 年 1 月,在东京当局的压力下,萱野被迫回国,和平接洽活动就此划上句号。

三

在梳理了萱野两次进行中日和平斡旋的活动过程后,我们还必须认真探索以下几个问题:

(一) 萱野的经历与他从事的调停活动的关系。

萱野出身于世代武士家庭,在他身上明显地烙上这一阶层所有的豪荡不羁、笃信果敢,却又不得不寄附他人的习性。但萱野的活动舞台主要在中国,在长期热情赞助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过程中,又形成了特有的中国情结。由于缺乏思想的理性提炼,他既鼓吹自由民主,又崇尚“个人权威”;既热衷于中日提携,共同抵御欧美侵略的“大亚洲主义”,又有狭隘的民族优越心理。这种矛盾的性格,为他在两次调停和平活动中的行动,定下了基调:他希望实现中日间的停战和平,却又倚重某些当权者的个人手腕和决断;他主张中日两国平等对话,却竭力以日本的方案说服中国。

从客观上说,进入 20 世纪以后,随着中日两国形成侵略和被

《萱野长知研究》,第 288 页。

侵略的关系,以官崎滔天、萱野长知等人为代表的大陆浪人左翼,已被时代抛弃,渐趋消沉,其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小。但抱着对“大亚洲主义”的热著信仰,他们依然不甘沉沦,伺机再起。在萱野看来,他从事的和平调停,是自己毕生追求的“支那革命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继续,因为只有将中日两国从战争状态拉回到平等相处这一历史原点上,“大亚洲主义”的理想才能实现。但是受经历、思想和民族的局限,抽象的地域、种族概念,障碍了其对日本侵略实质的认识,使他不可能直面日本的侵略暴行,象支持辛亥革命那样,同情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联合日本国内进步人士投入反战运动。相反,囿于浪人武士的思维定式,不辨孰是孰非,竭力以其充满幻想色彩的和平理念,来调和两个敌对国家的利益冲突,并为此不顾与侵略者同流合污之嫌,与犬养、近卫、小川、头山满等政客和狂热的对中国扩张主义者谋皮。到头来,不仅孜孜以求的调停活动空手而归,而且为中日双方所共同抛弃。然而,萱野能够两次被推为斡旋和平的唯一人选,并在战争期间保持最长的谈判渠道,不仅是由于他同中日两国朝野人士都有密切的交往,更重要的是基于他所持的空泛、抽象的“大亚洲主义”的理念和“超然”态度,而为中日两国当权者各取所需;在中方,他被用作迟延日军进攻,阻止汪伪政权成立的策略手段;在日方,他被当作诱降国民政府,达到不战而胜目的的一种工具。

(二) 萱野期望的和平与日本诱降目的的区别。

萱野在两次调停活动中,多以日本拟定的方案去竭力说服国民政府,因而在形式上似乎是接受了日本当局的指派,和秉承日本政府的旨意。然而在国民政府丧师失地、日军侵占中国大片国土的情况下,如果不想通过积极地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来获取中日间真正和平的话(如前面所分析,这对萱野来说根本不可能),那他只有首先顾及“战胜”一方的要求。但这不能说明萱野在

中日停战和平问题上,没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事实上,他对日本提出的旨在全面亡华的“和平”方案感到不满,曾多次表示,“强加条件,迫使(对方)签字的作法,使时局无法收拾”。笔者认为,在中日处于敌对状态下,萱野所期望的和平,与日本侵略者追求的,以使中国全面屈服为目的的“和平”旨趣迥异,不可同日而语。这样论断的依据是:

1. 始终坚持以蒋介石为对手的解决方案,反对在中国扶植傀儡政权。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主流派,一直存有恐日的心理,对依靠自己的力量抵御日本的侵略缺乏信心。因此,不是企求国联调停,就是幻想与日妥协,求得和平。但这种妥协求和的倾向,基本上是以维持中国主权为底线。这也是出于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利益考虑。深谙国民党事务的萱野不可能不清楚蒋介石等人的政治态度,因此他始终谋求只以蒋介石为对象的和平谈判。九一八事变期间,他力主南京政府势力进驻东北,对张学良政权实行改造,并要求日本派遣地位相当的代表进行政府一级层面上的谈判,以解决两国的悬案,这同日本处心积虑地推行排斥中央对东北的政治影响,造成该地区的独立状态的“满蒙分离政策”是根本对立的;中日战争期间,萱野更是专心致志地寻找与蒋介石政府的和谈渠道,不管遇到多大阻力和挫折,都始终不渝,表现出极大的耐性和毅力。谋求以蒋介石为对象的谈判,实际上就是承认蒋介石政府的正统地位,承认中日和谈中双方的平等立场。很显然,在这一前提下,任何能使谈判获得成功的方案,最起码有别于日本图谋已久的全面征服中国的计划,必然不会超过蒋介石接受的最低条件——维持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限度。诚然,在日本统治层内部也有

《萱野长知研究》,第 274 页。

所谓“和平派”,主张以蒋介石为谈判对手。但其立足点在于谋取不战而胜的“廉价胜果”,正因为如此,他们不可能将其立场贯彻到底。在实施诱降策略碰了钉子后,便立即转向拉拢汪精卫和其他实力派。小川、头山满这些狂热的大陆扩张主义者最终放弃对蒋介石的“和平工作”不足为怪,甚至平时与萱野政见相近、素以同情中国革命事业自居的民间“和平”人士绪方竹虎、神尾茂等也都追随军部强硬派,在筹组汪精卫傀儡政权上曾效犬马之劳。即使在这种“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萱野依然独自坚持正视蒋介石政府的态度,不怕陷害和打击,抨击扶植汪伪政权,以实现对中国殖民统治的政策。足见其对中日和平理念的执著追求。

2. 反对日本在驻兵问题上的强硬立场。

萱野的两次和平斡旋,均为试探性的预备谈判,最终未能实现为两国政府间的正式外交接触开辟道路的目标。从技术层面上分析,是因为双方从一开始即在比要求蒋介石下野更为棘手的撤兵问题上,处于针锋相对的立场。如果说日本在蒋介石下野问题上出现过某些政策松动的话,那么在撤兵问题上则是铁板一块,毫无转圜的余地。日本统帅部明确表示:战胜国让战败国约定撤兵时间是不名誉的表白,这对不起前线苦战的官兵”。一旦承诺,“中国事变的成果势必化为乌有,而且将危及满洲国的存在,甚至动摇朝鲜的统治”。因此“绝对不能容许”。萱野对日本在撤兵问题上的顽固立场,表示出截然不同的态度。他在九一八事变期间,力劝日本放弃武力侵华政策,以王道主义为立足点,弃霸道,从王道。调停失败后,又对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短视,流露出不满和失望的情绪。中日战争爆发后,在寻找对蒋和谈渠道的过程中,逐渐与小

[日]犬养健:《扬子江仍在奔流》,中公文库 1984 年版,第 102 页。

[日]参谋本部编:《杉山笔记》,原书房 1967 年版,第 346 ~ 350 页。

川等人产生严重分歧。他认为要实现和谈必须首先确立基础条件,并与中方确认了三项原则,从而否认了小川以“反共”为名,拒绝接受中方撤兵要求的态度。和平工作彻底失败后,萱野更是醒悟道:结束中日战争的根本出路在于日本全面撤兵。可以说是否答应无条件地从中国撤兵,是衡量日本政府“和平”真意的试金石,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体现了萱野与日本大陆扩张主义者的根本不同。

3. 在中日战争原因论上的正确态度。

对中日战争爆发的原因,萱野有比较正确的历史观,尽管由于受阶级和所处地位的局限,萱野对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恢复主权的正义行为进行指责,认为中国的过激行动和国民党依赖国联的外交政策是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然而,激发这些言论的出发点,主要不是为日本的侵华战争辩护,而是对他所追求的“中日提携合作”理念日益远离现实的失望和消极情绪的一种发泄,事实上,在敦促国民党政府“反省”的同时,他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进行了尖锐批判。最难能可贵的是,他认识到日本武力政策是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根源。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加深和平工作的一再受挫,萱野对战争原因这一重大是非问题的态度更加鲜明。如前所述,中日战争前夕,萱野认为刺激中国人民排日感情的原因在于日本对华的军事行动,因此,他竭力呼吁当局改弦更张,尊重中国的民族权益。中日战争相持阶段最为惨烈时期,萱野更是毫不隐讳地指出,日本所进行的是一场不义的战争。如果他是中国人也会彻底消灭无礼至极的日军,直到其全面撤退为止。在日本法西斯猖獗的环境下,敢于大胆地揭示中日战争的真实原因,鞭笞日本的侵略行径,是要有足够的勇气的。

《萱野长知研究》,第 300 页。

《萱野长知研究》,第 300 ~ 301 页。

(三) 萱野两次和平调停的历史地位。

萱野的两次和平调停,作为中日战争期间政界上层的幕后活动,并不能改变两国交战的进程,因而也鲜为后人所知。因为要调停势如水火的两个敌对国,其失败的结局也许是命定的。但它并非一无是处。仅坚持以对等谈判作为结束战争的唯一选择这一项,即在日本统治阶层内部引起不小的震动。在日本当局看来,萱野调停九一八事变反而增强了国民党中央政府对东北的政治影响力,与日本施行的“满蒙分离政策”相悖。因此百般阻挠,甚至出现了森恪等人截留私人信件这一幕。犬养遭暗杀是军部嫉恨政府软弱的对华政策引起的,但其导火线早已在此埋下了;而萱野调停中日全面战争,则更暴露了日本的虚弱本质,及和平的虚假面目,因而令日本当局大为恼火,勒令其撤回,并置于严密监视之下。与此恰成鲜明对照的是,萱野的调停活动却受到蒋介石、孔祥熙等国民党最高层的大加褒扬。这不仅是出于礼貌的应酬,更是蒋介石寄希望通过萱野来实现政治谋略心情的流露。蒋方人士认为,“利用中日在野名流私人和平谈判”,可以“籍机探讨日本真相”,“破坏日本组织统一伪政府企图”,“分化其国内主战及反战之势力”等。从萱野调停活动的实际效果来看,蒋介石在军事上遭受重大挫折的同时,在政治谋略上或多或少地从中觅得了收获。

(作者陆伟,1964年生,同济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刘兵)

《萱野长知研究》第273页。

杨天石:《孔祥熙与抗战期间的中日秘密交涉》,《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第106页。